

The Unconscious of Translation

By Banu Tellioglu

Translated by ZHANG Nian & SHANG Yulan

Received: March 21, 2024

Accepted: April 2,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Banu Tellioglu, trans. ZHANG Nian & SHANG Yulan. (2024). The Unconscious of Transl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062–07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4>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a substantial body of literature has emerged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Lawrence Venuti's article, *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occupies a prominent position within this body of literature for two significant reasons: First, it challenges the descriptive paradigm for neglecting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while primarily focusing on norms that influence translational behavior, Venuti's article urges translation scholars to engage in comprehensive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analyses of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Second, unlike most studies in the field, this article provides concrete examples and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how such analyses can be conducted. Building upon Venuti's articl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potential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practices that employ psychoanalytic theory as a framework and explore how a text-centered approach can help overcome them. To accomplish this objective, this study begins by reviewing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in literary criticism, emphasizing the shift in focus from the author to the formal features of the work. It then focuses on the approach that prioritizes the formal features of the work as the primary object of analysis and highlights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exploring the unconscious of the text. Following this, the study scrutinizes whether Gideon Toury's descriptive approach exclud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as an object of research, as suggested by Venuti, and if so, explores potential explanations for this exclusion.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of Venuti's methodology, the study critically analyzes two examples presented by the theorist. Ultimately,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focu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should be on the unconscious of translation and suggests that the concept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our methodological inquiries in psychoanaly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Keywor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analyt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the unconscious of the text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ransLogos*, 2023, vol 6, issue 1: 21–44.

Notes on the author: Banu Tellioglu, Assistant professor at Kırklareli University. ORCID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2969–4993>.

Notes on the translators: ZHANG Nian & SHANG Yulan, both of them are MTI students at Jishou University.

ZHANG Nian's email is 903633114@qq.com and SHANG Yulan's is 1569537741@qq.com.

論譯本無意識

¹巴努·特利奧魯/文 ²張念 尚玉蘭/譯

¹特拉基亞大學;²吉首大學

摘要: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量文獻資料顯示精神分析理論在翻譯領域中的應用已有學者進行了相關探索。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文章《譯製異:論譯者無意識》在相關文獻體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原因有二:首先,韋努蒂文章挑戰了描述性研究範式,批判了其忽略譯者的無意識,而過度關注影響翻譯行為的翻譯規範,也敦促翻譯學者對譯者無意識進行全面的描述性與批判性分析。其次,與該領域大多數研究不同的是,韋努蒂此文提供了具體的譯例,並嘗試說明如何進行該類分析。本文以韋努蒂的文章切入,旨在發現以精神分析理論為框架的翻譯批評實踐中潛在的方法論挑戰,並探索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研究方法論,以此闡明何以應對這些挑戰。為實現該目的,本研究首先回顧了精神分析理論在文學批評中的應用,強調從關注作者到關注文本形式特徵的轉變,並將作品形式特徵作為首要分析對象,凸顯了探索文本無意識所涉及的方法論意義。此外,本研究還探討了吉登·圖裏(Gideon Toury)的描述性研究是否像韋努蒂所述,將譯者無意識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若如此,研究便需探討此類除權的潛在解釋。為評估韋努蒂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研究另對該學者提出的兩個例子進行了批判性分析。研究最終認為,翻譯批評的關注點應放在譯本的無意識上。該概念為我們在精神分析翻譯批評方法論探索中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關鍵詞:精神分析理論;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翻譯批評;譯者無意識;文本無意識。

來源:原文原載於《翻譯運各斯:翻譯研究雜誌》(*transLogos 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2023年第六卷第一期。

作者簡介:巴努·特利奧魯為特拉基亞大學副教授。

譯者簡介:張念,吉首大學外國語學院 MTI 在讀研究生,903633114@qq.com;尚玉蘭,吉首大學外國語學院 MTI 在讀研究生,1569537741@qq.com。

一、引言

2013年韋努蒂發表《譯製異:論譯者無意識》^[1]。在文中,他呼籲翻譯學者們能更系統地運用精神分析理論:

[1] 該文於2002年首次發表在《翻譯研究:新興學科的視角》(*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一書中。後來,作為韋努蒂2013年出版《翻譯改變一切:理論與實踐》(*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收錄了該文。在本研究中,筆者使用了這一重印版本。

為挖掘譯者無意識,翻譯學者顯然需為翻譯過程或產品帶來一套來自精神分析傳統的理论假設。若無此假設,譯者無意識便不會顯現,也無法被分析。我們研究最富成就的譯者所犯的誤譯,其意義也不會超出誤譯文本的範疇(55)。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韋努蒂撰文之前,就有部分學者對精神分析理論產生濃厚的興趣。1982 年, *Meta* 雜誌發表專欄,探討精神分析理論與翻譯的關聯,雖然當時僅有三篇文章出自翻譯學者之手,但它們代表了對精神分析理論在翻譯界的最初研究跡象。該現象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一直持續。在 21 世紀初,對這一領域感興趣的人有所增加。1998 年, *TTR* 雜誌專門刊登了一篇關於精神分析理論與翻譯研究融合的研究,這為後來將精神分析理論作為研究框架的研究人員奠定了基礎(Frota 2007: 4)。可以說,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學界湧現了大量相關文獻,其中就包括翻譯研究領域傑出學者——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羅斯瑪麗·阿羅喬(Rosemary Arrojo)、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等人的學術貢獻^[1]。

韋努蒂(Venuti, 2013)的這篇文章與上述大多數文獻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主張翻譯學者應對譯者的無意識進行全面的描述性或批判性分析,且文章中向人們展示了藉由具體案例進行該類分析的具體案例。該研究並非該領域內的大多數研究那樣,常局限於在理論層面論述精神分析與翻譯。韋努蒂在談到翻譯描寫範式的創始人圖裏時,他稱,翻譯研究的描述傳統主要關注決定譯者選擇的規範,這忽視了他們的無意識。據韋努蒂的說法,規範是「譯者在職業生涯中內化的語言和文化資源」,通過內省或批判性審視輕鬆地進行檢索和闡明(33)。然而,無意識卻是無法理解的,可能需要由另一主體進行調查研究或在隨後地分析語境中由譯者本人進行。韋努蒂認為,如果翻譯學者期望在已有基礎上進一步瞭解翻譯本質及翻譯創造意義的方法,他們應集中於「錯誤/誤譯」這一方面,「因為這些誤譯、誤解或誤判彰顯了無意識動機,是被壓抑的焦慮,是滿足欲望呈現的症候」(55)。韋努蒂聲稱,有必要對譯者無意識進行廣泛描述。只有通過對譯者無意識的描述,才有可能揭示出「譯者無意識的不同面向,如翻譯與個人、文化與政治間的區別」(33)。為了達到以上目的,韋努蒂採用折衷主義來研究各種翻譯文本中的誤譯,試圖將這些錯誤與譯者的無意識聯繫起來,其中包括比較原文和譯文文本片段,參考歷史、作者或譯者的個人背景,以及其他翻譯專家共同協商等多種研究手段。

基於韋對努蒂方法論的批判,本研究旨在識別以精神分析理論作為框架進行翻譯批評時可能存在的的方法論缺陷,並探討如何通過文本中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缺陷。為達到目的,筆者首先綜述了精神分析理論在文學批評中的應用,強調了從作者、內容和讀者到作品形式特徵的研究重心轉移。該綜述以主題而非時

[1] 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的開創性著作《異域的體驗》(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1984/1992)是對譯者無意識的開創性貢獻。貝爾曼認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可避免地出現某些扭曲外文文本結構完整性的傾向,使譯文偏離其預期目的。因此,他認為,要揭示這些傾向,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至關重要。譯者們需努力探索並確定這些傾向產生的節點,並認識到這些傾向會影響他們的實踐。貝爾曼將這一探究的過程稱為「翻譯的精神分析」(6)。據資料顯示,羅斯瑪麗·阿羅喬(Rosemary Arrojo)是首位將精神分析理論的基本思想應用於翻譯教育領域的翻譯學者,其論文《解構、精神分析與翻譯教學》(Deconstructio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2012),最初以葡萄牙語於 1993 年發表。在文中,她質疑了理性主義認為知識可以完全掌握或控制的觀點,為翻譯教學提供了寶貴的見解。此外,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在其著作《翻譯與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 1996)中,他旨在通過借鑒精神分析理論來轉變讀者對翻譯行為的看法。為實現這一目的,羅賓遜效仿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將注意力集中在根深蒂固的翻譯禁忌上,而這些禁忌持續影響著我們的當代翻譯思想。羅賓遜的著作《誰來翻譯?: 超越理性的譯者主體性》(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2001),還借鑒了拉康關於「他者」的概念;即我們所感知到的任何外部事物,超出我們本身的意識見解,且超出我們控制的範圍,這都被視為「他者」。羅賓遜的研究目的在於觀察譯者在引導這些多樣「他者」過程中的複雜機制,以此闡明譯者如何確立和展現他們的身份(10-11)。

間順序進行,主要借鑒了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對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的分類法,並歸納了每一類研究者所用方法的重要價值。隨後,筆者將重點放在了將作品形式特徵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的研究方法上,旨在闡明並追溯文本無意識相關的方法論意義。筆者進而將探討圖裏的描述性方法是否如韋努蒂所假設的那樣,忽視了譯者的無意識,若是,筆者將提供這種遺漏的潛在原因。最後,筆者分析了韋努蒂文章中提到的兩個案例,以評估翻譯理論家所用手段的有效性與局限性。

二、精神分析理論與文學批評

精神分析理論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於19世紀末提出,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被作為文學批評的概念框架或批評方法。伊格爾頓在其著作《文學理論導論》(*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96)一書中,將精神分析文學批評分為四類,「作品關注對象」;「作品的作者」;「作品的內容」;「作品形式結構或讀者」^[1](155)。20世紀50年代前,最早將精神分析理論應用於文學批評的學者以作者為關注焦點,該方法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分析文學作品來揭示作者的無意識,傾向於將作者的文學選擇與其個人生活聯繫起來,批評家將文學作品視作揭示作者壓抑欲望的幻想或願望,從而得到關於作者心理的結論。例如,他們會分析作品中的人物以揭示作者的無意識欲望。他們認為作品中的人物反映了作者內心被壓抑的一面(Fox 1995: 429-430)。伊格爾頓(1996)提到的第二種方法旨在借助精神分析理論分析作品中的事件、人物和/或某些符號,它代表了一個即使是今天仍然盛行的悠久傳統。伊格爾頓認為:

大多數精神分析批評都屬於前兩種類型(傳統精神分析批評和對讀者回饋的精神分析批評),實際上這兩種類型範疇有限,問題最多。對作者進行精神分析是一種推測性研究,當我們在討論作者「意圖」與文學作品的關聯性時,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關於「內容」的精神分析——評論人物的無意識動機,或評論文本中物體或事件的精神分析意義——價值極其有限。類似淺顯追求文學表徵途徑的研究往往過於簡單。弗洛伊德本人在藝術和文學領域為數不多的嘗試也主要是在以上兩種模式下進行的(155)。

根據伊格爾頓的觀點,最初基於作品對作者進行精神分析的方法,類似於傳統的批評方法,認為作品與作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作品是作者思想和意圖的見證。伊格爾頓將這種做法描述為「推測性行為」,因為他認為無法辨別出作者的精神狀態在文本中的反應程度,就像假設作品準確反映了作者意圖一樣是錯誤的。第二種則是運用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作品的內容,這也存在一定的風險性。批評家們試圖揭露人物的無意識動機,或展示文本中出現的物體、圖像或事件的精神分析意義,這可能會忽略作品的完整性,拉低作品對它所描繪的事件或人物情感狀態的重要性。在尋找象徵對象時,批評家甚至可能會過於專注某一特定對象,從而忽視了它在整個作品中的真實意義或次重要性。

當代批評家認為瑪麗·波拿巴(Marie Bonaparte)1933年的研究《愛倫·坡:精神分析研究》(*The Life*

[1] 除標記引用部分外,所有內容皆為原創。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體現了上述兩種方法,主要是因為它試圖將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與他的精神狀態相聯系,將他的作品視為一種臨床現實(Tristán 2014: 56)。不僅如此,為了尋找可以用精神分析理論解釋的象徵,波拿巴甚至將愛倫·坡某個故事中的貓身上的白色斑點與詩人母親的乳汁聯繫起來(Wright 2003: 42-43)。另一個例子是弗雷德里克·克魯斯(Frederick Crews)對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靈》(*Heart of Darkness*)的批評。根據克魯斯的觀點,主人公前往中非的旅程直接反映了作者渴望回到母親子宮的欲望(Ellmann 1994: 2)。當代批評家莫德·埃爾曼(Maud Ellmann)指出,波拿巴和克魯斯的解釋是「富有想像力的」,但他們沒有關注「文本的文學共鳴」。簡而言之,波拿巴特和克魯斯都拋開了作品的文學形式,只關注作者的心理狀態或作品的內容。

以讀者為焦點的批評手段集中於作品如何吸引讀者被壓抑的欲望和幻想。然而,批評家們這裏關注的主要問題是讀者心理。換言之,這與「幾乎完全以作者為中心」的方法不同,這種類型的精神分析文學批評主要在於「分析讀者的反應」。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伊格爾頓(1996)建議,批評家可嘗試探索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強調文學作品在形式方面如何引起讀者的某些回饋。這種方法主要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即出於文學作品中的某些形式或手段,讀者面對他們被壓抑的欲望和令人不安的焦慮時,建立了起一種防禦機制。例如,美國批評家西蒙·萊瑟(Simon Lesser)認為,文學有助於緩解讀者的焦慮,並確保個人忠於現有的社會秩序。同樣,諾曼·荷蘭(Norman Holland)也試圖通過闡釋的過程來說明讀者是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份,最終揭示內在的統一感。然而,根據伊格爾頓的觀點,這些研究存在以下幾個根本問題。首先涉及文學具有治癒讀者的功能假設。萊瑟和霍蘭德的研究內容似乎都忽視了大多數現代文學作品「破壞秩序,顛覆意義,粉碎我們的自信」(158)的觀點。其次,原始精神分析原先強調「主體分裂」,現在被「自我統一」取代。這種替換表明了一種假設,即個人身份的本質可以從個人經歷中提取^[1]。最終,由於這種更替,文學成為了治癒讀者的一種形式,或成了一種工具,用以幫助修復不符合社會規範的人格特質;而「弗洛伊德主義最開始是對中產階級社會的醜化和侮辱,但後來卻成為呼籲中產階級社會價值觀的一種理論進路」(159)。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關注語言,並以此拓展了精神分析的整體架構,伊格爾頓受其影響提出了針對文本形式結構的批評方法。拉康認為,無意識像語言一樣被結構。這不僅是因為它如同隱喻和轉喻那樣運作,更是因為它主要是由能指構成,並非穩定的所指。例如,當一個人夢到一匹馬的時,不能立即明確這個形象代表什麼,它可能存在許多自相矛盾的含義,它亦或是一系列能指的一部分,均具備多義性。如索緒爾所定義的那樣,馬的形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符號,因為它沒有與之關聯的固定所指。相反,它屬於能指,可以與各種所指相關聯,且它還可能在其周圍承載其他能指。故而,無意識是一種連續的能指運動與活動,其所指往往因為被壓抑而無法獲得。簡言之,無意識是一個關於「意義不斷淡化或消失的過程」,「任何試圖在語言或劇本中傳達一個整體、完美意義的嘗試都是一種前弗洛伊德式的幻覺」(146-147)。

這一觀念帶來了文學理論上的重要革新——將「語言和交流」置於文學批評的中心(Wright 2003: 121)。作者地位的衰落導致了「作者—作品」聯繫的解體,進而讓文學文本獲得了自主性。批評家逐漸摒棄

[1] 伊格爾頓(Eagleton 1996)將這一假設與美國自我心理學運動聯繫起來,他認為這是弗洛伊德主義的馴化版本,它將注意力從古典精神分析的「分裂主體」轉移到「自我統一」上(158)。

了「作品具有作者意欲塑造的固定含義」這一看法。相反,他們「基於無意識像語言一樣結構的理論」,專注於「將文本視為心靈的感知」(114)。簡言之,精神分析批評的對象是文本本身或文本的形式結構,批評家們希望揭示的是文本的無意識而並非作者的無意識。

三、文本的無意識與閱讀的無意識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專注於文本無意識意味什麼? 根據烏伯托·艾科(Umberto Eco, 1994)的說法,它指的是批判性地解讀文本,「以便在我們對它的反應中,發現關於它本質的東西」(57)。艾科認為,雅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對愛倫·坡《失竊的信》的精神分析解讀是這種批判性解讀的良例。在分析中,德裏達尊重了文本的意圖(intentio operis),即文本的形式特徵和完整性^[1]。埃科說:

德裏達在從發現信件夾在壁爐中央的一個掛鉤上這一事實中得出解釋時,他首先從「字面意思」理解了敘述所設計的可能世界,以及愛倫·坡在描述這個可能世界時所使用的語言的意義。接著,德裏達試圖解析出這個文本傳達的第二個「象徵性」意義,表明這篇文章所傳達的意思可能超出了作者的意圖。無論對錯,德裏達都用文本證據支持了他的第二層語義解釋。在這樣做的同時,他也進行了批判性的解讀,因為他展示了文本如何產生第二層意義(57-58)。

艾科進一步聲稱,德裏達的閱讀與瑪麗亞·波拿巴對《失竊的信》的精神分析閱讀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波拿巴給出了一個完美的文本分析起點,但最終她將文本中發現的一些資訊與愛倫·坡的私人生活聯繫起來,完全忽視了文本的意圖。因此,艾科總結道,她並沒有對愛倫·坡的文本進行批判性解讀,而是將其用於自身目的。這也意味著波拿巴關注作者的無意識,而德裏達選擇將焦點放在文本的無意識上(58)^[2]。

在德裏達的著作《解構主義與精神分析》(2000)中,埃爾曼還闡述了德裏達追溯文本無意識的概念。在埃爾曼看來「當德裏達認為傳統的精神分析批評未能關注到文學能指的獨創性時,他指的是精神分析批評忽略了文本的形式,而過於專注文本內容」(214)。有趣的是,儘管拉康是「將無意識視為永恆淡化的意義」的先驅,但他在分析愛倫·坡的短篇小說《失竊的信》時卻受盡了德裏達的批判:在他渴望解析出精神分析真理的過程中,拉康完全忽略了故事文學性。在德裏達看來,對真理的追求無法在文學中實現,因為文學回避了這種追求。就像小說《失竊的信》一樣,文學的意義始終難以捉摸,無法確定。這並不意味著意義無法表達。相反,這表明文學作品的意義是流動的,在故事的讀者間流傳,就像愛倫·坡筆下的人物之間傳遞信

[1] 雅克·德裏達的文章《真相的提供者》(1975年)批評了雅克·拉康對愛倫·坡短篇小說《被偷走的信》的分析。在這篇文章中,德裏達還給出了自己對這個故事的分析。在承認德裏達論述存在過於簡化的風險時,可以簡要稱,他的文章展示了信件在不同人手中不同背景下的運動中意義的不穩定性。對於同一故事的其他分析,像瑪麗亞·波拿巴和雅克·拉康的分析,請參閱 Muller 和 Richardson(1998)。

[2] 將艾柯的觀點和後結構主義,尤其是解構主義批評家的觀點歸為一談,認為三者完全一致是不準確的。艾柯將讀者的角色限度為文本意圖,並將文本視為潛在解釋的唯一參數,具有局限性。與之相比,解構主義則賦予了讀者更多的自由,可以「選擇從哪個層面入手對文本進行提問」(Pisanty 2015: 53)。同時還避免了出現文本固有地包含確定解釋可接受性的標準的觀念。儘管如此,德裏達在《真相的提供者》中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可以認為是以文本為中心的方式。莫德·埃爾曼(Maud Ellmann, 2000)認為,雖然德裏達反駁解構主義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點,但他對文學能指的獨特品質的關注使他與更廣泛的思想家傳統保持一致,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象徵主義那裏(213)。

件一樣,總是從他們手中滑落。意義的不確定性亦不僅限於傳統意義上被視作文學的文本。此外,德裏達對弗洛伊德作品的分析展示了他寫作的某些特徵,如隱喻、敘事技巧、神話回憶和個性化風格創造了新的闡釋空間(同上)。簡言之,對德裏達來說,文本無意識主要指的是文本中被壓抑的意義——那些被掩蓋但可以通過仔細推敲文本的文學手段,運用解構閱讀策略來求得的文本意義。

伊格爾頓對文本無意識觀念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與德裏達類似。根據伊格爾頓(1996)的觀點,批評家們首先應該集中關注文本中的缺失或模稜兩可之處。原因在於,一部文學作品「它並未完全表達其意,或並非其所言」(154)。為了解釋批評家如何或本應如何利用精神分析理論,伊格爾頓作了以下陳述:

我們正在構建一種可以稱之為作品的「潛文本」的東西——它存在於某一作品中,我們可在某些存在「症候性」歧義、回避或過分強調的地方可見到這類文本。即使作品本身不存在這類潛文本,我們作為讀者也能夠「寫」出來。所有文學作品都包含一個或多個這樣的潛文本。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作品本身的「無意識」。與所有的寫作一樣,文學作品的真知灼見與它的盲點密切相關:它什麼都沒說,以及它如何沒有說,這可能與它所說的同等重要;關於它的那些看似缺失、邊緣或矛盾的東西可能為它的隱含意義提供了一條中心線索(155)。

這裏提出的方法與弗洛伊德有關夢的理論,及拉康對該框架的進一步闡述密切相關^[1]。伊格爾頓在拉康的研究基礎上,指出弗洛伊德的關於夢的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們使我們將文學作品視為一種生產方式。伊格爾頓認為夢和文學作品的處理方式在本質上是大同小異的。就像夢將無意識的欲望等「原始材料」通過一定的技巧轉化為「成品」,即所做的夢。文學作品將語言或其他文學文本等原始材料加工,將其轉化為產品。「用於實施這種生產的技術正是我們熟知的「文學形式」的諸類手段」(157)。精神分析師在分析夢時不僅關注「夢的文本」即夢的內容,還關注「夢的工作」即夢的工作方式。他們特別關注「可能提供夢「潛在內容」或受無意識驅動,構成其內容的詢喚途徑,即扭曲、模糊、缺失和省略,並認為這樣的「途徑」具有較高價值」(158)。文學批評也能做到這一點,它既可關注文本中未說的話,以及重複、不一致或模糊之處,也可探索作品背後隱藏的內容;或者說它可以嘗試著揭示作品創造的潛文本,並將這一潛文本看作是文本的無意識。簡言之,文學批評不僅可以超越分析文本所說的內容,還能關注它如何運作或創造意義(同上)。

以文本為主要分析對象,只專注於文本無意識可能存在潛在的缺陷。基於文本中心的死板批評可能會在批評家與文本之間建立一種單向關係。這時,批評家扮演與精神分析師相當的角色。在這個角色中,批評家通過闡釋來處理文本的歧義,同時破譯了文本的象徵意義,如精神分析師通過分析解決了被分析者的問題一樣。是否可能採取替代的方式以防止批評家在「批評-文本」的結構中佔據主導地位?在洛雷萊·卡拉曼-帕斯卡(Lorelei Caraman-Paşca)的文章《從文本作為症狀到評論家作為分析者:精神分析批評的新方法》(2013)中,作者指出,新生代批評者,如莎珊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讓-貝勒明·諾埃爾(Jean Bellemin-Noel)、皮埃爾·巴亞爾(Pierre Bayard)和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代表著批評潮流向「閱讀

[1] 拉康認為夢不是弗洛伊德傳統意義上的壓抑的表現和預示,而是一種話語形式。這種視角允許對夢進行精神分析探索,以此作為深入瞭解文學的一種手段,正如對文學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對無意識的更深入瞭解一樣(Fox 1995: 432)。

無意識」的範式躍遷。這種新方式更加強調閱讀和闡釋的過程，關注這一流程影響、改變作品、讀者或批評家的具體途徑。所以，這一研究範式的重點是讀者或批評家無意識與文本無意識間的相互作用，目標則是展示它們如何相互作用與轉化，故避免了批評-文本的參差結構(87-92)。

莎珊娜·費爾曼的工作為探討「閱讀無意識」的方法論意義提供了寶貴的視角。在其文章《轉動解釋的螺絲釘》(1977)中，費爾曼介紹了一種新穎的精神分析閱讀方法，即結合批判性閱讀來分析文本。她將這種方法應用到了對亨利·詹姆斯的中篇小說《螺絲在擰緊》的批評中。仔細研究了圍繞該作品的各類批評所使用的修辭，她發現批評家們的言論再現了文本的關鍵主題。費爾曼稱：「與批評的種種內容相比，我認為更具啟發性的是批評風格。仔細探究了這些批評家的話語後，我發現它們以驚人的規律，不自覺地重複了該文本的所有辭彙主題」(98)。

鑒於此，費爾曼認為讀者或批評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本的影響，並通過重複閱讀文本再現文本的無意識。在她看來，理解文本的不是讀者和批評家，而是文本理解了讀者和批評家(115)。換言之，知識的權威性推定存在於文本本身，而不在於闡釋的內容。費爾曼通過顛覆文本與批評家之間的等級關係，將文本從以往作為分析對象的被動地位中解放出來，挑戰了以文本為導向的傳統批評規範。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法論層面，她採取的路徑仍可被認為是一種「文本中心法」。原因在於，她主要關注文本使用的修辭及其批判性評價。下文將闡明她在方法論層面上的立場。與德裏達和伊格爾頓的立場一致：我們對《螺絲在擰緊》的解讀與其說是嘗試發現謎團的解決之道，不如說是追隨作者天馬行空的言說軌跡；我們不是為了解決或回答文本的謎題，而是為了探究文本的結構；不是為了定義或明確文本的模糊性，而是為了理解文本模糊性的必然性和修辭功能。該閱讀方式背後的問題並不是「這個故事意味著什麼？」而是「故事的意義是如何表現的？」質言之，何以藉由永恆迭代，文本生成意義，並產生一種「疏離」的效果(119)。

可以看見費爾曼的創新觀點不僅強調了文本在塑造闡釋過程中的積極作用，而且突出了分析(批評)作品形式結構的重要性。她賦予文本產生意義的方式以及批評家如何利用其中的模糊之處來揭示不斷變化和遠離他們理解的意義的痕跡，凸顯了她以文本為中心方法的傾向，以及她對解構主義視角的傾向。

四、吉迪恩·圖裏描述性方法的翻譯過程

就目前形勢來看，我們應將注意力轉向翻譯研究領域，重視圖裏的描述性策略。正如本研究引言部分所闡述的那樣，韋努蒂認為描述性範式的創始人圖裏有意將譯者的無意識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韋努蒂也暗示道，描述性學派在翻譯研究的盛行是導致長期以來忽略譯者無意識的主要因素^[1]。因此，本節主要說明，圖裏是否將譯者的無意識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若答案是肯定的，就需要重新審視圖裏對翻譯過程的看法，並探尋其背後的原因。

在《描述性翻譯研究過程的基本原理》(1982)中，圖裏將翻譯過程喻為「黑匣子」(25)^[2]。儘管他認為

[1] 類似的論斷，請參閱 Frota 2007。

[2] 最早使用這種類比的理論家是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他在1972年發表的文章《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一文中宣佈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並強調描述性研究的重要性，在文中他還表示，希望在未來，翻譯這一高度複雜的過程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從而形成一個可以稱之為翻譯心理學或心理翻譯研究的領域。

翻譯過程就如同翻譯後的文本本身,是翻譯研究中的一個實證事實,是翻譯研究的對象,但他認為翻譯過程中準確把握譯者的心理活動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黑匣子一般無法確定。我們無法準確描述翻譯過程的運作方式以及譯者如何做出翻譯決策。研究者們只能嘗試通過觀察到的現實狀況以及「翻譯研究本身以及其他相鄰學科框架內建立的理論假設(包括心理學)」來暫時重現翻譯過程(同上)。在圖裏看來,研究者們應首先從觀察到的事實,即瞭解翻譯文本後再著手重現翻譯過程,然後「朝著非觀察事實的重現道路前進,而不是另闢蹊徑」(同上),否則這一重現過程可能因其可測性受損而變得不穩定。

圖裏在其重要著作《描述性翻譯研究及其他》(2012)中進一步闡釋了重現翻譯過程的概念。該著作第十四章集中討論了相關實驗。圖裏引用了翻譯界的幾項實驗。例如,他提到了一項旨在測量譯者眼動的研究,以及一項調查同聲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瞳孔擴張與認知負荷間潛在聯繫的研究。隨後,圖裏深入探討了有聲思維法的相關研究——該實驗要求參與者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口頭表達他們的想法。記錄譯者的口頭表達,如果可能的話,還會錄影,以便分析譯者工作過程中的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隨後研究者會對這些經詳細轉錄的錄音進行仔細審查,以期數據分析結果可為翻譯過程提供有價值的見解(269-270)。儘管圖裏對該類研究持有保留意見,但他仍堅持認為,只要研究人員追求「規模更小且更易測試的實驗假設」(275),這些實驗技術便可用於重現翻譯過程。

根據現有證據,韋努蒂關於圖裏排除譯者無意識的主張似乎是合理的。圖裏既沒有明確表示也未暗示譯者無意識是影響翻譯過程的因素。雖然,他承認在翻譯研究領域可對翻譯過程進行調查,但他重現「黑匣子」的概念涉及實驗性研究,用以測試既定假設。因此,我們可合理推斷出圖裏對翻譯過程的重現並不包括探索譯者的無意識。此外,儘管圖裏建議使用心理學領域的假設,但似乎這與精神分析無關。這可以歸因於經驗層面測試譯者無意識的固有挑戰。圖裏強烈主張將翻譯研究建立在科學基礎上,強調翻譯產品高於翻譯過程。對經驗主義的強烈關照可證明其實證主義傾向,以及他在翻譯學科早期提升學科地位的願望。有趣的是,他堅持研究可觀察和可測量的翻譯要素,與那些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學批評家崇尚的路徑相符。這些批評者將文學作品的形式結構置於作者無意識之上。與他們一樣,圖裏將注意力集中在翻譯後的文本本身,卻對譯者的無意識置之不理。

五、譯者無意識:陷阱與貢獻

從韋努蒂所定的標題《譯製異:論譯者無意識》可以明顯看出他提出了一種不同的觀點。韋努蒂圍繞威廉·韋弗(William Weaver)的觀點構建了他的論文。韋弗認為翻譯是譯者無意識而不是有意識決策的產物。根據韋努蒂的說法,在翻譯研究領域探討這一關鍵主張的研究數量極其有限。他認為這樣的研究匱乏主要源於描述性範式的主導地位。這導致翻譯學者更注重影響譯者選擇的語言和文化因素,經常描述易於重現與分析的規範,而不關注譯者的無意識。韋努蒂認為,精神分析理論學者的研究也對翻譯研究的貢獻有限。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這些研究通常將翻譯理解為一個概念,說明無意識材料如何轉化為症狀,並在夢中表現出來,或者作為一個概念,說明精神分析家如何解釋這些症狀和夢境。韋努蒂宣稱,他的主要目標是專注於翻譯行為,探討在這個涉及語言和文化的複雜過程中,無意識材料如何反映在譯者的選擇中。換句話說,韋努蒂試圖重建影響譯者決策過程並在翻譯文本中顯現出來的譯者無意識(33)。為此,他明確表

示將在其研究中利用後結構主義理論，並通過具體例子說明，他何以借鑒雅克·德裏達、讓-雅克·勒塞克勒(Jean Jacques Lecercle)和雅克·拉康等理論家的思想來重建譯者無意識(34)。接下來，本文將專注於韋努蒂的兩大案例，並對他所採用的方法進行評價。需指明，選擇這兩個案例的原因在於：它們分別體現了「充滿挑戰」以及「充滿啟發」的研究方法。筆者期望通過並置這兩大案例可有效突出韋努蒂在文章中所採取的矛盾立場，同時也能借此闡明筆者在翻譯批評仲介精神分析理論的見解。

第一個案例是一首詩的翻譯。韋努蒂(2013)借此說明譯者無意識的政治維度。他借用了弗洛伊德關於口誤的概念，並關注唐納德·D·沃爾什(Donald D. Walsh)1972年對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在你身上，大地》(En Ti La Tierra)」^[1]的翻譯。起初，韋努蒂比較了兩首詩的開頭，並認為「沃爾什的詩意取代了聶魯達的簡練」(43)。然後，他將注意力轉向無意識，將這一現象與譯者的無意識聯繫起來。在該詩倒數第二行中，短語「los ojos mas extensos」翻譯為「spacious eyes」。韋努蒂稱，這一選擇「不同尋常」，因為形容詞「extensos」有意思更接近的英文對應詞，比如「vast」或「wide」(同上)。然而，韋努蒂發現，該英文短語喚起了一首像美國國歌一樣的詩歌開頭，即凱瑟琳·李·貝茨(Katherine Lee Bates)的「America the Beautiful(美麗的美國)」^[2]。這首詩經常傳唱於公共場合^[2]。為了探索這種潛在的回聲，韋努蒂諮詢了「頗具成就的西班牙詩英譯家」(44)。其中，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建議，所討論的短語「可能」會喚起與「America the Beautiful」相關的聯想，且沃爾什的選擇「可能」不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溫伯格說道，「人們永遠也無法知道，但我猜想「spacious skies」不是有意識的，而是在腦子裏某個地方卡住的東西的突然浮現」(同上)。筆者也強調這點。基於這一觀點，韋努蒂深入探究了沃爾什的教育背景和職業成就，並斷言譯者選擇「spacious eyes」「無疑」是他無意識的表現，反映了一種無意識的政治願望(同上)。韋努蒂對該觀點解釋如下：

聶魯達的「《在你身上，大地》(En Ti La Tierra)」是一首愛情詩，在這首詩中，一位陷入愛河的詩人通過將其所愛的女人比作大地表達了對她的感性描述……沃爾什的譯本當然保留了這種比喻，但聲學上的語言剩餘改變了它的意義：情人俯身親吻的不僅僅是大地，或他所愛的與大地類似的女人，而是美麗的美國，一個在貝茨(Herbert Ernest Bates)詩中經某種程度擬人化的國家(44-45)。

在韋努蒂看來，沃爾什的翻譯由一種無意識的願望驅使。這種願望的對象是一名以左翼批判美國資本

[1] 此處為唐納德·D·沃爾什對詩歌的英文譯文「Little / rose, / roselet, / at times, / tiny and naked, / it seems as though you would fit / in one of my hands, / as though I'll clasp you like this / and carry you to my mouth, / but / suddenly / my feet touch your feet and my mouth your lips: / you have grown, / your shoulders rise like two hills, / your breasts wander over my breast, / my arm scarcely manages to encircle the thin / new-moon line of your waist: / in love you have loosened yourself like sea water: / I can scarcely measure the sky's most spacious eyes / and I lean down to your mouth to kiss the earth」(Neruda 1972: 2-3; in Venuti 2013: 42)。巴勃羅·聶魯達的詩歌如下：「Pequeña / rosa, / rosa pequeña, / a veces, / diminuta y desnuda, / parece / que en una mano mía / cabes, / que así voy a cerrarte / y llevarte a mi boca, / pero / de pronto / mis pies tocan tus pies y mi boca tus labios: / has crecido, / suben tus hombros como dos colinas, / tus pechos se pasean por mi pecho, / mi brazo alcanza apenas a rodear la delgada / línea de luna nueva que tiene tu cintura: / en el amor como agua de mar te has destado: / mido apenas los ojos mas extensos del cielo / y me inclino a tu boca para besar la tierra」(Neruda 1972: 2-3; in Venuti 2013: 42)。

[2] 凱瑟琳·李·貝茨名為「America the Beautiful」的詩歌如下：「O beautiful for spacious skies, / For amber waves of grain, / For purple mountain majesties / Above the fruited plain! / America! America! / 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 / And crown thy good with brotherhood / From sea to shining sea!」(Venuti 2013: 43)。



主義而聞名的著名智利詩人聶魯達,例如他在 1966 年的戲劇《華金·穆列塔之輝煌與死亡》(*Splendor and Death of Joaquin Murieta*)中一樣,而非提及美國的民族主義形象,從而表達他對這個國家的感情(45)。此外,韋努蒂試圖通過提供關於冷戰時期和智美關係的細節,並根據譯者生活非常有限的資訊得出關於譯者意識形態的結論,來支持他的觀點。為了建立這些資訊與譯文之間的聯繫,他再次進行了有限的文體比較,並斷言該譯文因譯者對虛擬語氣和將來時的使用,明顯偏離了西班牙原文。據韋努蒂稱,譯者的具體選擇表明,與西班牙文本相比,譯文以更漸進的方式展現了與女人的邂逅,從而強調了對美國詩句「親吻」回應的重要性。他認為,這種強調表現出了「譯者對智利危機採取保守意識形態解決方案的強烈無意識欲望」(47)。

在這一點上,筆者嘗試詳述韋努蒂批評中的主要問題,突出他的實踐與他所推崇的後結構主義框架之間的不一致。首先,可以認為在這個特定案例中,韋努蒂未能提供批評性的闡釋,而是利用譯文為自己的目的服務,這讓人想起了波拿巴的研究。韋努蒂為了借助口誤概念解釋語音相似性,忽略了譯文的文學特徵和詩歌的完整性。譯者所作的尋常選擇只是讓韋努蒂想起了一首美國詩歌的開頭,他關注於「spacious eyes」和「spacious skies」兩個短語之間的相似之處,卻忽略了譯者有意選擇「spacious」一詞來達到與西班牙詩歌類似詩意效果的可能性。韋努蒂對這種相似性的關注使他忽視了「spacious eyes」一詞中的噁音,這與西班牙短語「los ojos mas extensos」中的噁音相呼應。此外,由於韋努蒂忽略了針對兩首詩的整體分析,他無法觀察到譯文和原文都在上述短語前後的行中出現了多次「s」音,這加強了譯者旨在譯文中反映這種語音元素的可能性。更有趣的是,韋努蒂尋求專業譯者的認可,試圖消除亦或是逃避這種可能性。他強烈希望尋找一個合適的口誤例子,致使他優先諮詢其他專家,而不去分析譯作的文體特徵。儘管從專家處得到了暫時的回應,但韋努蒂仍然堅定不移地基於「spacious eyes」和「spacious skies」兩個短語之間的相似之處構建他的解釋。

第二個方法論問題與第一個問題密切相關。儘管韋努蒂聲稱採用後結構主義視角,探討了個體譯者唐納德·D·沃爾什的生活以及他所處的社會政治背景,試圖說明沃爾什的無意識如何在譯文中顯現出來。實質上,在譯文範圍以外的地方尋求解釋基礎,特別是在譯者的生活中,韋努蒂最終得出了對譯者的精神分析解釋,這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高度推測性甚至「想像性」的結論。例如,作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的一名管理者,沃爾什參與製作了一份關於外語教育的報告,主張學習外語對國家的好處。韋努蒂(2013)借用埃爾曼(Ellmann)的說法(1994: 2)將這一資訊視為沃爾什「保守立場」的明顯跡象,並認為沃爾什在譯文中使用「spacious eyes」一詞是這種政治傾向的明顯標誌(45)。雖然可以想像沃爾什可能有民族主義情緒,其無意識政治願望可能影響了他選擇這個短語的決定,但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樣,有意選用該短語來實現噁音,與沃爾什的政治立場無關,這也是同樣可能的。無論我們對作者/譯者的生活瞭解多少,我們試圖在這些資訊與作者/譯者的無意識之間建立直接關聯都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臆測結果^[1]。

筆者所關注的第二個例子涉及艾倫·巴斯(Alan Bass)所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寫作與差異》(*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的一個段落。韋努蒂(2013)在這段文字中發現了兩個相互矛盾的句子,其含義

[1] 筆者承認任何解釋都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推測,讀者或評論者的絕對客觀性是一種幻覺。此處使用「推測」一詞指的是伊格爾頓(Eagleton)所認為的意義,意味著解釋是在錯誤假設了作者或譯者的意圖或心理狀態與其所創作的文本之間存在直接關聯的情況下構建的。想避免這種推測的似乎是大多數文學評論家,結構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以及翻譯理論家如吉迪恩·圖裏等人強調將文本作為研究主要對象的根本原因。

有所偏差。在將翻譯與法文原文進行對比後，韋努蒂指出了巴斯的錯誤：段落的第一句說無法通過翻譯將外文文本的物質性轉移到目標語言中。然而，譯者在第四句中將不定冠詞「un」譯為指示形容詞「that」，導致了相反的含義，意為外文文本的物質性確實可以通過翻譯轉移到目標語言中(38)^[1]。因此，最初看似簡單的錯誤最終導致了重大差異。為了證明巴斯的錯誤不是因為能力不足，韋努蒂調查了譯者的教育和職業背景，重點介紹了其在翻譯德裏達的文本方面的經驗以及他目前作為精神分析師的角色。那麼，是什麼導致了巴斯犯下這樣的錯誤呢？韋努蒂認為，這個錯誤體現了弗洛伊德所說的「誤讀」。該錯誤揭示了譯者的無意識欲望，即「翻譯將在完整性和物質性上還原至原文，不增不減。翻譯通過與原文建立此種相似性，以克服語言和文化之間不可歸約的差異」(39)。隨後，韋努蒂基於拉康的理論進一步闡述了外文文本中的能指暗示著文本永遠無法得以完全翻譯，這一現象又如何能在譯者心中激發了一種不完整感，以及譯者的無意識如何嘗試彌補這一不完整感。^[2]

儘管韋努蒂在整個研究中強調重建譯者無意識的重要性，但他對這個例子的處理更接近於尋找文本無意識的路徑。或者，在翻譯語境下，筆者更傾向於稱之為「翻譯無意識」。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韋努蒂只關注了法文段落及其翻譯的文本屬性，並從文本證據中得出了他的解釋。起初，他確定了譯文中的不一致之處，並進一步研究外文文本，以揭示譯文所抑制或未能傳達的內容。隨後，他運用精神分析理論的基本原則來構建關於這種抑制的解釋。韋努蒂在這裏的方法論也標誌著評論家們分析的起點，即強調外文和譯文之間的不一致性，尤其是譯文中顯現出的某些模糊、逃避或過分強調的「症候性」內容(Eagleton 1996, 155)。第二點，且更為重要的是，韋努蒂花費了不必要的精力來證明巴斯作為譯者的能力，並推翻任何他能力不足的因素，這表明韋努蒂傾向於將實際譯者的生活與他的工作相提並論。這說明，韋努蒂工作的重點並不僅僅是巴斯的無意識。相反，韋努蒂通過一個歸因於巴斯無意識的誤譯，突顯了所有譯者可能都有的一種被壓抑的欲望，即在翻譯中追求完全的對等。總而言之，韋努蒂運用精神分析理論來研究翻譯文本中意義是如何生成的，並聚焦於翻譯行為中的一種內在意願。如此一來，韋努蒂提供了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翻譯批評的一個令人信服的示範，且與翻譯研究領域中許多經常局限於概念性討論的研究不同，他成功地彌合了理論與實踐間的鴻溝。

六、結語

以上分析揭示了一個有趣的矛盾。韋努蒂雖然展示了追尋翻譯無意識的啟發性案例，強調了翻譯如何創造意義，但該文面臨著維持方法論一致的挑戰。正如首個例子所示，揭示譯者無意識的政治維度過程中，該學者無意忽視了譯文中的文學元素與完整性。此外，他超出了文本本身的範圍，深入到譯者的生活細節，

[1] 法語原文如下：「Or un corps verbal ne se laisse pas traduire ou transporter dans une autre langue. Il est cela même que la traduction laisse tomber. Laisser tomber le corps, telle est même l'énergie essentielle de la traduction. Quand elle réinstitue un corps, elle est poésie. En ce sens, le corps du signifiant constituant l'idiome pour toute scène de rêve, le rêve est intraduisible」(Derrida 1967, 312; in Venuti 2013, 34)。艾倫·巴斯對文章的翻譯如下：「The materiality of a word cannot be translated or carried over into another language. Materiality is precisely that which translation relinquishes. To relinquish materiality: su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ranslation. And when that materiality is reinstated, translation becomes poetry. In this sense, since the materiality of the signifier constitutes the idiom of every dream scene, dreams are untranslatable」(Bass 1978, 210)。

[2] 在精神分析理論框架內專門探討譯者對可翻譯性的意願，並圍繞忠實度將其問題化的啟發性研究，可以參考 Basile (2005) 和 Öner Bulut (2018)。

這樣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推測性的解釋。在筆者看來,這些問題源於他對譯者無意識的強調,這與本研究的第三部分所述精神分析文學批評中文本中心方法的原則相矛盾。

對韋努蒂文章(2013)中的話語進行分析產生了另一引人注目的結果:一方面,韋努蒂明確將自己與後結構主義理論家聯繫起來,將他們的理論和術語作為其批評的方法論基礎。另一方面,他在文章中使用諸如「實驗」(44)、「描述」(34)、「解釋」(34)、「重現」(33)、「假設」(56)和「經驗證據」(56)等術語來表達他的目標和建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術語與韋努蒂最初崇尚的描述性研究策略有關,它們從根本上根植於結構主義思想。因此,人們可能會將這些術語視為韋努蒂無意識根植於結構主義思想的表現,尤其是被抑制的描述主義意願。或者,借費爾曼的觀點,我們可以將韋努蒂使用這些術語解釋為通過重複來創設描述範式的話語。這些觀察結果部分解釋了文章在後結構主義和傳統邏輯之間搖擺的原因,也闡明了韋努蒂採用折衷方法論的緣由,也說明了為什麼韋努蒂傾向於明確區分「譯者無意識的不同方面,譯者性與個人性、文化性與政治性」幾對概念。我們似乎可以將各對概念中的單一要素分離開來,比如,「譯者性」本身並不涵括「個人性、文化性和政治性」(33)。

毫無疑問,韋努蒂的文章涵蓋的範圍比本文中所概述與批評的內容要廣泛得多。儘管存在一些方法論問題,但其文章成功地將後結構主義相關理論命題納入翻譯批評中。事實上,這證明了韋努蒂作為一位先驅研究者的勇氣。他通過具體案例大膽探索了譯者無意識這一概念。在這方面,他的文章無疑為翻譯批評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韋努蒂為該學科做出的另一重要貢獻在於他對描述性研究的批判,後者忽視了翻譯中意義生成過程中無意識的作用。韋努蒂適恰地論證了我們必須脫離描述性翻譯研究以及掙脫制約翻譯過程的規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我們納入譯者角色和主觀性的過程中,沉溺於精神分析翻譯批評實踐中的推測結果。相反,我們必須超越譯者無意識,培養出對「外文—譯文」相互作用;譯者、翻譯行為以及譯評家間交互關係更為全面的理解。為實現這一點,筆者建議採用另一種方法,即努力追蹤譯本無意識,將譯文視為所有這些前述元素彙聚、碰撞、作用以及轉化的交匯點。

將精神分析理論基本原理應用於翻譯批評是一項重要且頗具挑戰的探索。制定一套全面的精神分析翻譯批評方法論已經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儘管如此,我們認識到了相關方法論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需要。筆者建議從當代文論家的理論創建處汲取靈感,努力建立有效的翻譯批評手段。筆者相信,韋努蒂將會贊同下述段落,因為我們嘗試將伊格爾頓和費爾曼的見解延伸至精神分析翻譯批評範疇中:

與所有書寫作品相同,譯文所沒有表達的內容,以及它「如何」沒有如此表達,可能比表達出的內容更重要;譯文中看似「缺失」、「邊緣化」或「模稜兩可」的地方可為我們提供有關翻譯行為本質的線索。作為翻譯批評者,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觀念,即沒有任何翻譯能夠完全與原作達到一致。有鑒於此,我們應更注重探索翻譯固有的「沉默」、「抑制」或「模糊」要素。我們的目標不是解開謎團,挖掘外文隱藏的終極真相,也不是扮演分析師的角色,通過回溯譯者的過往經歷來重建特定譯者的無意識,而是採取以文本為中心的途徑來理解「翻譯中文本歧義的固有必要性和修辭意義」。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創設一種批判模式,幫助我們追蹤翻譯實踐中的微妙運作,深入瞭解這一實踐背後的複雜機制。只有這樣的批判嘗試才能告訴我們,翻譯如何產生與複製意義,意義又如何在本層面呈現併發揮作用,以及它又如何在本層面「悄然溜走」。